

教育考察記

【上】

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
主編 王寶平

教育考察記

呂順長
編著

【上】

杭州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教育考察記/王寶平主編
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8
ISBN 7-81069-013-2

I. 晚… II. 王… III. 教育史-日本-近代 IV. G531.39

中國版本圖書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29885 號

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 教育考察記(上、下冊)	主編 王寶平 編著 呂順長	出版發行 杭州大學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三十四號)	郵編 三一〇〇二八 印刷 浙江印刷集團公司	版次 一九九九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九九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開本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 印張 六十七	印數 二百二十萬字	定價 一百九十六圓(上、下冊)	ISBN 七-八-一〇六九-一〇三-1/G·0021
-----------------------------	------------------	------------------------------	--------------------------	-------------------------------	-----------------------------	-----------	-----------------	----------------------------

總序

王寶平

據考古發現，日本列島長期與大陸緊密相連，大約在一萬年以前才逐漸形成目前這種一水相隔的狀態。地緣的相近，決定了兩國必相往來，而文字的相親，極大地增強了交往的密度。自古以來，中國的史乘筆記對日本以及中日間的這種交往可謂史不絕書，它們為我們研究古代日本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中日關係史提供了取之不盡的豐富史料。但是客觀地說，這些史料往往帶有中華文化中心的思想，含有不少獵奇、非科學的成份。這可謂中國古代日本研究的第一階段。

有明一代，倭寇撓邊，警報不絕，人民的生命財產慘遭塗炭，朝廷統治倍受威協。抗倭鬥爭的需要促使一大批將領幕僚研究日本，從而產生了《日本考略》、《日本一鑑》、《日本考》等一系列研究日本的專著，形成了第一次日本研究高潮。這是以抗倭為目的進行的日本研究的第二階段。

明亡清興，邊患消除，天下太平，於是日本研究復趨平靜。這時期，通過長崎一隅，中日貿易頻繁。由此誕生了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東洋記》（一七三〇年）、童華的《長崎紀聞》（一七三五年）、汪鵬的《袖海篇》（一七六四年）等一批以日本長崎為背景的著作^{〔1〕}，構成了以反映中日貿易為中心的第三階段日本研究的特色。

一八六八年，日本維新，易號明治，開始走脫亞入歐之路。日本的變化引起了近鄰中國的關注，有關日本動靜的報導經常出現在報端^{〔2〕}。初時，清廷對這「蕞爾小國」心存幻想，欲籠絡之為我所用。臺灣一役，日本一開始就訴諸武力，顯示出後起資本主義的急迫和露骨，震驚朝野。緊接着，炮擊江華島，吞併琉球等事件接踵發生，日本對外擴張的野心昭然若揭，迫使中國對之高度警惕。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日本研究漸次進入以防範為主要目的的第四階段。

這階段的前期，即光緒前十年誕生的著作以日本遊記為主，從李圭的《環遊地球新錄·東行日記》（光緒二年，一八七六）起，中經首屆駐日公使何如璋的赴任日記《使東述略》（附《使東雜詠》，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副使張斯桂的《使東詩錄》（同上）、王韜的《扶桑遊記》（光緒五年，一八七九）、王之春的《談瀛錄》（同上）、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同上），一直到李筱圃的《日本紀遊》（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大多以日記和詩的形式記錄訪日觀感。這些遊記的作者，有的如王韜、李筱

對於上述光緒以來中國人的日本研究著作，最早予以重視而進行蒐集和整理的是已故早稻田大學教授實藤惠秀先生^[1]，他根據這些著作多以「東遊日記」命名的特點，將它稱之為「東遊日記」。今天，東京都立圖書館實藤文庫收藏有他積畢生心血蒐集的數千種頗具特色的舊藏，其中，「東遊日記」達二二七種（含民國時期的七十七種），恩澤學人不淺。如同任何比喻都是跛腳的一樣，「東遊日記」的名稱雖未必十全，却因其反映了近代中國人大量東渡日本，吸收西方文明這一歷史的特質而廣為學界所接受。「東遊日記」遂成了晚清光緒年間至民國前期國人赴日考察、留學的日記、報告和研究著作的總稱。

迄今為止，學界對留日學生作了大量細緻的調查研究，而對官吏的考察涉足較少。事實上，由於官吏身居官職，思想成熟，在留學生大量回國發揮作用之前，是他們先期引進西方文明，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的艱難歷程。勿庸諱言，在某些東遊日記中，存在一些浮光掠影、議論膚淺、資料拼湊等弊病。但重要的不是它們敘述水平的高下，而是他們代表了一個敢於跨出國門，直接去國外感受新事物和新氣象的社會羣體，開創了走出傳統思想的藩籬，面向世界的新風尚。在他們的筆記中，這些飽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知識分子面對陌生的異域文明，經受的心靈衝擊程度未必相同，文化認同也不盡一致，但有一點一以貫之：筆敘日本，意在中國，他們為謀求祖國自強自立的良苦用心躍然紙上。從甲午戰爭到今天，歷史已跨過一個漫長的時間。雖然中國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事實上我們面臨着與先人同樣的一個課題：如何完成現代化事業。因此，這些東遊日記，不僅是中日關係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資料，更是近代中國謀求整個社會形態和文化模式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留下的生動記錄，它對我們正在進行的現代化事業也具有客觀的借鑑意義。

中國自八十年代以來，鍾叔河、王曉秋、武安隆等先生對東遊日記進行了整理與研究^[2]，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原杭州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自一九八九年成立起就將東遊日記作為主要研究課題之一，近年又有熊達雲、汪婉等留日博士分別對政法、教育考察記作了深入細緻的研究^[3]。這說明該課題正日益引起學界的重視，其史料價值正在進一步得到發揮。但是，由於東遊日記數量龐大，館藏分散，利用極為不便。有鑑於此，我們不揣樸昧，將數年來克服種種困難苦心蒐集的這些資料整理成編，命名為《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公諸同道，以期為學界做些鋪墊性工作。本叢書分綜合、教育、軍事、政法、農工商考察記以及唱酬等專題，每種或輯數人為一卷，或收一人成一書，首冠前言、解題，後附索引，影印時力爭保持原貌，個別模糊不清的地方作了必要的技術處理。

東遊日記的蒐集與研究，先後列入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一年）、日本國際交流基金

(一九九八年度)以及住友財團(一九九九年度)的科研項目,本叢書為其中間成果之一。

杭州大學出版社多年來鼎力扶持我的科研成果,除出版了《日本文化研究叢書》(已出八種)和《中日文化論叢》(已出七種)外,今天又毅然推出本套叢書,這種熱心支持學術研究的精神將永遠銘刻在學人的心間。

一九九九年六月三十日
於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

註釋

【一】《長崎紀文》,一卷,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童華自序,乾隆中刊本。是書對中國銅商在長崎的貿易、日常生活等情況的描寫,可補其他同類文獻之不足。

【二】清前期還誕生了吳江翁廣平撰的《吾妻鏡補》(一名日本國誌,三十卷,一八一四年自序)一書。這部著作雖非描述長崎貿易的專著,但在卷十三、十六、十七等處多次言及。詳見拙編《吾妻鏡補——中國第一部日本通史》,日本京都,朋友書店,一九九七年。

【三】如《申報》在創刊之年中頻頻刊登有關日本的消息:「日本使臣至花旗見國君(同治十三年四月初一日)」、「日本地震(四月初八日)」、「東洋欲改服色(四月初十日)」、「(日本)博物院(四月十五日)」、「論東洋新造金小洋錢(四月二十八日)」、「論東洋人男女同浴(四月二十九日)」、「東洋改服色(五月初一日)」、「論東洋博物院事(五月初八日)」、「日本治度信息(五月初八日)」、「日本英國近事(五月十四日)」、「日本近事(五月二十日)」、「論東洋新鑄大小銀錢銅錢事(五月二十一日)」、「論日本通商事(五月二十四日)等等,可謂日本的一舉一動盡在觀察之中。

【四】王之春此行訪日的目的在曾任兵部侍郎的彭玉麟為王著所撰的《談瀛錄序》中表述得很清楚:「欲防日而不先悉其形勢要害、風俗美惡、政治得失,則無由攻瑕擊隙,以制其死命。而又慮臨之以師旅則易啟爭端,重之以使節則反招猜忌也。思期得一不動聲色、直探巢穴、密訪周覽、洞悉露情於胸臆者,久之難其選。王爵堂觀察聞命奮袂請行……」。

【五】《直督李鴻章奏日使大久保抵琅玕約期撤兵鴻請遣使駐日本片》,《清季外交史料》,第一卷八頁。

【六】當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規定「東西洋出使各國大臣務將大小事件逐日詳細登記,仍按月彙成一冊咨送」。《清同光間外交史料拾遺》,卷五八頁。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一九九一年。

【七】黎庶昌,《庚寅謄集三編·題襟集》,四頁,五頁,一八九〇年駐日清使館序刊。

【八】參見拙文《晚清文人與日本——光緒年間寓日文人考》,《中日關係史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三期,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北京市中日關係史學會合編,一九九八年八月。

【九】例如,張百熙等提出的《奏定學堂章程·學務綱要》(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規定:「各省辦理學堂員紳,宜先派出洋考察。……歐美各國,道遠費重,即不能多往,而日本則斷不可不到……」(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上冊,五三三至五三四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郭督張飭湖北實缺州縣出洋遊歷博覽周諮札命:「各該員刻日領咨起程,自備資斧,赴東遊歷,毋稍延緩。」(《申報》,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學務處呈覆

遵議各州縣派人籌備公款遊歷日本以備充當學董辦法文》(《申報》，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對官紳遊歷作了非常具體的規定。

【十】實藤惠秀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開始了對東遊日記的研究。如《東遊日記研究序說附東遊日記目錄》(《日華學報》八二號，日華學會，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以及其一系列著作等等。

【十一】鍾叔河：《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岳麓書社，一九八五年。

王曉秋：《近代中日啟示錄》，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

武安隆、劉玉敏：《嚴修東遊日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十二】熊達雲：《清末中國官民的日本視察》，日本甲府，山梨學院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一九九八年。

汪婉：《清末中國對日教育視察的研究》，日本東京，汲古書院，一九九八年。

前言

呂順長

清代中國和江戶時代的日本，曾不約而同地將閉關鎖國視為一項重要國策而極力推行，其結果是閉目塞聽，對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國家不斷走向衰退。然而隨着十九世紀後西方勢力的東漸，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砲迫使兩國不得不進行歷史性的選擇。

一八六八年，日本通過明治維新，開始不遺餘力地汲取西方近代文明而大步邁向世界。

清政府素以「天朝上國」自居，視四鄰諸邦為「蠻夷戎狄」。是鴉片戰爭的砲火開始使部份國人漸感「外夷」已非我邦所能輕敵。為求存圖強，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的一些清朝官吏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主張學習西方新式船砲，抵禦外敵的侵略；洋務派官僚們也主張以「中體西用」的原則，學習西方軍事技術和應用科學。然而事與願違，甲午一役，中國竟慘敗給「東夷小國」日本，人們方知數十年的洋務不僅不足以敵歐美，就連維新不久的日本都難以抗衡。

痛定思痛，朝野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以日本為媒介攝取西方近代文明乃中國求存圖強之最佳捷徑。這是因為日本和中國相比，在政治上，日本自明治維新後所採取的君主立憲制度與中國洋務派官僚所倡導的「忠君愛國」、「中體西用」原則相一致，不致於使中國因攝取西方文明而動搖政體；在近代史上，兩國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列強的壓迫，因而均有強烈的求存圖強願望；在文化上，日本有二千餘年致力於汲取中國文化的傳統，而且語言文字相近，易於通曉；在吸收西學上，日人已對其不切合東方實際者加以刪節和酌改，易為我所用；在地理環境和風俗習慣上，兩國同屬東亞，有許多共同和相近處，便於人員往來。更為重要的是，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為中國提供了一個直接可以借鑒的經驗。

晚清中國以日為師，大致可歸納為赴日留學、赴日參觀考察、招聘日本教習、翻譯日本書籍等四個途徑。它們各有特點，互為補充，共同構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為壯觀的場面。

衆所周知，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對留日學生、日本教習以及翻譯日本書籍的研究起步均較早，研究成果汗牛充棟，且近年還不斷有新成果問世。而對晚清中國人赴日參觀考察的研究則相對起步較遲，直至近年才逐漸引起學界廣泛重視。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影印出版這套《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意在為這一項研究作一些基礎的資料性的工作，以促進這一研究的深入發展。筆者負責教育考察記部份，故對其有關內容進行了耙梳和整理。水平有限，錯誤和疏漏在所難免，敬請前輩同行指正。

一

晚清中國人的日本教育考察，大致可分為一八七一年《中日修好條規》的簽署至甲午戰敗、甲午戰敗後至清朝覆滅兩個階段。

自一八七一年中日兩國簽訂《中日修好條規》，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後，兩國先後互設外交使館並互派外交官常駐，這為兩國間的人員往來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自此兩國間官員、學者、文人往來絡繹不絕。赴日者中不乏將所見所聞整理成文字向國內介紹者，其中有不少就涉及到了日本的教育。

黃遵憲作為第一代駐日公使館成員於一八七七年赴日，滯日期間著《日本雜事詩》，後又出版《日本國志》，是晚清介紹研究日本最具影響的人物。《日本雜事詩》自一八七九年由京師同文館出版以來被廣為傳播，現已確認的翻刻版本就達十餘種。書中共收錄各類「雜事詩」二〇〇首，其中以學校或教育為內容者有六首，它們分別是：「學校」、「留學」、「海陸士官學校」、「女子師範學校一」、「女子師範學校二」、「幼稚園」。通過這些詩以及著者在這些詩後添加的註釋，人們大致可以了解當時日本尤其是東京已有學校的主要種類、大體規模、課程設置及其特點等概況。一八八七年完稿、一八九五年刊行的四十卷五十萬言巨著《日本國志》第三十三卷則設有「學制」條，對當時日本的教育作了較為詳細的記述，如七大學區的分佈、官立學校公立學校私立學校並舉的辦學模式、各類學校的數量、教員數量及男女比例、教科書種類、教學及考試方式、學士制度、辦學經費的來源、町村學務委員制度等，並附有七大學區學事統計表，表中收錄了各學區人口、學齡人員及其就學比例、各類學校的學生及教員數等各類統計數字。

一八八九年出版的傅雲龍的《遊歷日本圖經》以大量的圖表對日本進行了全面的介紹，其中也有不少有關日本教育現狀的記載。一八八七年著者以清政府所派遊歷官的身份先後兩次停留日本，其間除會見各界人士，參觀官署、工廠、博

物院、兵營等外，還參觀考察了各類學校二十餘所。《圖經》二十卷下所載的各類統計表有：學校合表、已未入學表、小學校師弟子表一、尋常中學校表、尋常師範學校表、專門學校表、高等女學校表、官立學校表、雜學校表、雜學校科表、幼兒園表、書籍館表、日本人留學別國計費表、公學費歲入表、公學費歲出表、學費歲出表，著者還在每一表前添加簡要的註釋，條理清楚，使人對當時日本的教育現狀可以一目了然。

《遊歷日本圖經》所收入的這些資料為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日本官方統計資料，距著者赴日僅早一年，可謂當時的最新資料。而前述《日本國志》所引用的多為明治十年前後的統計資料。因此，兩者相比，《圖經》不僅比《日本國志》所收的資料豐富而新近，加之其正式公開出版的時間也遠比《日本國志》早。因此可以說最早系統全面地向國人傳播介紹日本近代教育現狀的著作是傅雲龍的《遊歷日本圖經》，遺憾的是此著的流播未及《日本國志》廣。

除上述著作外，陳家麟的《東槎聞見錄》（一八八七）、顧厚焜的《日本新政考》（一八八九）、黃慶澄的《東遊日記》（一八九四）等都對當時的日本學校教育狀況有不同程度的記載。

以上著作對晚清中國了解日本教育無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遺憾的是，這些甲午戰前赴日者的日本考察研究著作，不僅記錄日本教育的内容所占比重不大，而且大多都停留在資料的羅列上。他們對日本教育的考察僅占其百科式考察的一小部份，對日本教育的理解尚缺乏深刻。

三

國內真正派遣官員對日本學校進行較為系統全面的考察始於一八九八年。是年春，湖廣總督張之洞擬派湘鄂子弟百人入日本成城學校，姚錫光便以湖北武備學堂兼自強學堂總督的身份，受張的委派率隊赴日聯絡學生入學事宜並考察各類學校，滯日約兩個月。此為近代中國派官員專程考察日本學校之嚆矢。此後，隨着國內興學運動不斷高漲，赴日考察教育之風一浪高過一浪。

與甲午戰前迥然不同，甲午戰後對日本教育的考察，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考察者看，專門赴日考察教育者自不待言，衆多的官員、民間文人學者、實業家、留學生等，盡管他們赴日的緣起和動機各不相同，但赴日後很多人往往轉移重心，「不務正業」地把大量的時間花在考察學校教育上，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中以教育考察的内容最為豐富就是重要例證；從考察方式上看，或參加教育現場，或聆聽講座，或與專家學者座談，考察細緻充分，與甲午戰前主要

停留在資料的蒐集和羅列的考察方式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從所考察的學校和內容看，從帝國大學到幼兒園，從教育宗旨到課程設置，學校不分大小，內容不分粗細，無所不包；從考察者對日本教育的理解之深刻程度上看，身臨其境的深入考察，使他們真正領悟到了「教育為本」這四字的真正含意，明白了日本後來居上的根本原因和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源所在。以下，我們不妨以考察者的赴日緣起和動機為綫索，對各類考察者作一簡述，以期勾勒出這一時期對日教育考察的概貌。

一、學堂關聯者。此類人員往往在已興辦或打算興辦的學堂任某種職務，學堂管理及教學上的需要促成他們赴日考察，赴日後考察目標明確，不流於形式。如：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江西於成高安鄒殿書邀朱綬、周泰瀛等十餘人創經濟學堂，並攜該校教習及廚師雜役等共十五人專程赴日考察日本學校。抵東京後，日本外務省指派小林光太郎充任翻譯，陪同考察了成城學校、戶山學校、陸軍中央幼年學校、士官學校、陸軍大學校、尋常小學校、美術學校、音樂學校、盲啞學校、尋常女學校、陸軍地方幼年學校、高等女子師範學校、高等師範學校等。此行向來被認為是中國近代最早以私費形式赴日的教育考察團。

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十一月，受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的委托，羅振玉以湖北農務局總理兼農務學堂總監督的身份携湖北兩湖書院監院劉洪烈、自強學堂教習陳毅、胡均、田吳炤、左全孝、陳問咸等六人赴日視察學務。自十一月四日上海啟航至翌年正月十二日回抵上海，考察時間約為兩個月。其間除考察了東京、京都、大阪等地的各類學校外，還多次與日本著名教育家嘉納治五郎、伊澤修二等長談，聽取改革中國教育方面的意見，還專門拜訪文部省普通學部局長澤柳君，向他請教教育事宜並索取有關教育資料。

一九〇一年，清政府決定重開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張百熙奏薦吳汝綸任大學堂總教習，吳固辭不就，「百熙具衣冠詣汝綸，伏拜地下曰：『吾為全國求人師，當為全國生徒拜請也。先生不出，如中國何！』汝綸感其誠，勉起應詔」。吳被任命為大學堂總教習後，請求先赴日本考察教育。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五月，吳以六十三歲的高齡率團東渡。同行者有大學堂提調榮勛、紹英、翻譯中島裁之等。一行自五月十五日長崎上陸至九月六日結束文部省聽講起程回國，滯日約四個月。此間吳遍訪各方人士，考察各類學校，聆聽文部省講座，對日本教育制度、學校運營等方方面面進行了細緻的考察。所考察的學校範圍極其廣泛，包括各級小學校、中學校、高等學校、大學等普通學校，師範、實業、藝術等專門學校，盲啞等特殊學校，以及幼兒園等。文部省講座的内容涉及教育行政、教育大意、學校衛生、學校管理法、教授法、學校設備、日本學校

沿革等，遺憾的是因回國時間緊迫而未能聽完全部講座。他所接觸的官員和文人學者大多與教育相關，如早稻田大學的創立者前首相大隈重信、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東京大學總長山川健次郎、東京師範學校校長伊澤修二、《教育時論》社主筆辻武雄、後受聘來華任京師大學堂教習的服部宇之吉和巖谷孫藏，以及包括大臣在內的文部省現任和前任的大批官員。

一九〇二年夏，上海姚子讓、劉景輿等商議創設學堂。鑑於「日本致力教育者三十餘年，其師範必多可採」，遂派該校教員項文瑞、曹千臣、賈季英、楊月如四人東渡考察各學校。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正月，江南高等學堂總教習繆荃孫、提調徐乃昌等受兩江總督張之洞的委派赴日考察教育。隨行者有江南高等學堂分教習六人及侍從三人。滯日約兩月，其間在外務省翻譯巖村成允和高等學堂所聘請的教習白河次郎的引導下考察了東京的各類學校，此外還專門請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就普通教育、師範教育、實業教育的性質、意義等問題作專門講座。

二、知州知縣。「新政」期間，各地總督巡撫為開地方風氣而紛紛派知州知縣赴日遊歷，有些省份還專門制定條文，規定凡實缺州縣人員，除到任已久不便離開職守者外，在上任前均應先赴日遊歷三個月。這些遊歷者的考察範圍往往較泛，可涉及行政、司法、教育、農工商等多方面，但有為數不少者到日本後就覺察到了中國落後的根本關鍵，從而把考察重點放在教育上。如：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六月，鄭元潛受直隸總督袁世凱的委派以「準補撫寧員缺」的身份赴日遊歷，考察日本學校、警察、司法、實業等。所考察的學校有：宏文學院、常磐小學校、東京府第一中學、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府立女子師範學校、第二高等女學校、東京帝國大學、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東京府官立職工學校、萬年小學、東京府立師範學校、東京府立美術學校、音樂學校、慶應義塾、大阪高等工業學校、高等商業學校（兵庫）。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二月，受直隸總督袁世凱的委派，郭鍾秀以井陘縣知縣的身份赴日。滯留東京兩月餘，並經京都、大阪、神戶各地，參觀考察官署、警察、監獄、學校、工廠等五十餘處。所考察的學校有：盲啞學校、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及其附屬尋常小學校附屬高等女學校和幼兒園、第一高等學校、西原農事試驗場、女子師範學校、常磐小學、美術學校、高等師範學校、萬年小學、府立第三高等女學校、農科大學、大阪高等工業學校、同文學院（神戶）。

三、率學生赴日留學者。此類視察者的赴日緣起，大多是受當地官員的委派率學生赴日留學並為其落實學校。他們利

用在日停留的機會對學校進行考察。如：

光緒二十三年（一九〇七）冬，湖廣總督張之洞擬派湘鄂子弟百人人日本成城學校。翌年正月，姚錫光以湖北武備學堂兼自強學堂總督的身份受張的委派，率隊赴日聯絡學生入學事宜並考察各類學校，滯日約兩個月。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四月，浙江候補知縣張大鏞奉浙江巡撫廖壽豐之令，與蔣錫之共率求是書院選派的錢承志、陳槐、何燭時、陸世芬和浙江武備學堂選派的肖星垣、徐方謙、段蘭芳、譚興沛等文武各四生赴日留學，並對日本各校進行考察，訪求「儲才選將之要」。張大鏞等赴日後，先聯絡安排武備學堂四生入成城學校，而求是書院選派的四生則由於無適當的學校，故臨時租一民房兼作宿舍和教室，懸一札曰「中華學館」，在中島裁之的監督下學習東文和普通學。此「中華學館」後來發展成了專門教育中國留學生的日華學堂。張、蔣兩人在日停留期間還參觀考察了日本各類學校以及兵營，並對所見所聞一一作了詳細的記錄。張大鏞的日本教育考察，在時間上僅次於姚錫光。姚在日本考察期間，曾通過當時在上海任《時務報》經理的汪康年將考察所得的日本學校概況寄給浙江巡撫廖壽豐，並在《時務報》上發表。此事引起了張之洞的極大不滿，後姚錫光不得不指使汪康年在《時務報》上發表聲明，稱：「本報第六十九冊載《日本學校規則》，乃姚石荃孝廉上南京制府書也。姚君以制府命遊歷東瀛，歸而以其國學校規則詳陳制府，其稿遍布鄂中，友人錄之寄浙，復由浙流衍至滬，故誤為浙撫廖中丞書，實則非也。」這才平息了風波。此事從一個側面表明了各地方開明長官對日本學事的重視。

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冬，山東大學總辦方燕年奉山東巡撫周馥之命赴日考視學事，居東凡兩月。翌年五月，著者再次奉命率五十餘名學生赴日留學，待安排學生全部入學，得暇再次考察學校後，結合上次考察所得，著成《瀛州觀學記》。

四、各省提學使。一九〇六年，成立不久的學部奏請撤去各省學政並新設提學使司掌管全省學務，不久獲準。提學使司設於各省省會，並任命提學使一名為其最高長官。當時被任命為各省提學使者二十三人中，雖部份人曾有赴日考察教育的經歷，但占多數的十六人却未曾遊歷過日本，學部遂奏請在上任前先派此十六人赴日本作為期三個月的教育考察。這十六人分別是：湖北提學使黃紹箕、浙江提學使支恒榮、山西提學使錫嘏、湖南提學使吳慶坻、黑龍江提學使張建勛、甘肅提學使陳曾佑、吉林提學使吳魯、福建提學使姚文倬、遼寧提學使陳伯陶、江西提學使汪詒書、新疆提學使杜彤、雲南提學使葉爾愷、廣西提學使李翰芬、陝西提學使劉廷琛、山東提學使連甲、安徽提學使沈曾植。

提學使一行以湖北提學使黃紹箕為團長，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六月十五日從上海啟航，同行者有學部右參議

林灝深及學部委員五人，另有隨員八人。抵達東京後，他們或參觀各類學校，或聽文部省的講座，或與日本官員及專家交換意見，通過各種方式考察日本教育行政制度及教育運營方面的經驗。有關文部省講座的内容，據駐日公使楊樞向日本外務大臣提交的講義計劃看，有各國學制及其沿革、教育方法及其變遷、日本興學的經驗、各種學校的性質及相互關係等四項，而實際講授的内容為：文部省參事官田所美治的「各國學制」、文部省視學官野尻精一的「明治年間之教育沿革」、文部省參事官松本順吉的「日本現行教育制度」與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小泉又一的「教育方法及其基礎」、「教育管理法大要」、「各學校目的性質及其關係」，實際講授的内容基本與中方所要求的內容相一致。

遺憾的是，由於至今尚未見到這些提學使所留下的考察期間的記錄，因此對其在日本的具體考察經過、所考察的學校等尚有許多不明之處。

五、赴日閱操者。明治末年，日本常在秋季舉行軍事大演練，世界上許多國家均派觀兵官前往觀覽，中國也不例外。這些從各省被派往日本的觀兵者在「觀兵」外，關注最多的就是教育，並把大量的時間花在學校的考察上。如：

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秋，日本舉行秋季軍事大演習。同年春，日本陸軍大尉井戸川辰三奉命來華，敦促中國派官員閱視考察。七月，文官沈翊清、武官丁鴻臣等一行受四川省總督奎俊的委派前往閱視。從日記看，著者花在考察學校上的時間比閱操的時間更多。

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九月，浙江派營務處候補道程恩培等四人赴日觀察軍事演習，其它如安徽、湖南、湖北、福建等省也紛紛派觀兵官前往。程恩培等一行自九月初一從上海出發至十月二十四日回抵上海，往返僅二個月。其間除赴千葉和仙臺觀看軍事演練不到十天外，其餘的大部份時間均花在學校的參觀考察上。所到學校有：千葉中學校、千葉醫學專門學校、成城學校、戶山學校、陸軍地方幼年學校、陸軍中央幼年學校、陸軍砲工學校、陸軍士官學校、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高等商業學校、高等工業學校、第一高等中學。程恩培作為一名軍事官員，此行的目的首先是參觀日本的軍事大演練，但同時他也認為：「今國勢阨危，強鄰夾處，或眈眈虎視，或煦煦市人跡，其蠶食之心如出一轍，神州蒼莽，來日大難。發憤為雄，庶幾有焉。故當務之急，教育為先，武備次之，蓋教育乃武備之基礎，武備即教育之見端，二者相為表裡。」充分表明了他對教育重要性的認識。而此次日本之行正好給他提供了一個考察日本教育以資國內參考的良好機會。在各校考察時，程無不對日本教育之發達表示贊嘆。如在千葉中學校，當他了解到學生數達五百五十人，且全國有如此規模者達數百處時，不禁感嘆「無怪其人才輩出也」，「非若我華之日守一經者，矻矻窮年，老死牖下也」。

六、參加博覽會者。此類遊歷者大多自籌資斧，他們往往早已心存遊歷日本的願望，但遲遲下不了決心或無適當的機會，而日本各種博覽會的邀請正好促成他們的日本之行。如：

實業家張謇，雖早有東遊考察之計劃，可因故一直不能成行。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二月，適值接到日本領事發來的參加大阪博覽會邀請，遂決定東渡。赴日後，除出席了日本第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外，着重考察了各類學校，還有工廠、銀行、農場、牧場、鹽田等，並會見日本各界衆多知名人士。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初，林炳章收到參加大阪博覽會的邀請，而且此時恰逢福州東文學堂改為師範學堂並擬聘日人教習。五月，著者以該學堂教員的身份受外舅陳伯潛之囑赴日考察教育、招聘教習並參加在大阪舉行的日本第五次內國勸業博覽會。

七、留日學生。此類考察者多為赴日習師範的學生，留學期間，他們邀請同窗或好友利用餘暇赴各校參觀考察，蒐集資料，有的還留下了考察記。如：

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五月，關庚麟等受廣東省選派赴日留學，入嘉納治五郎主持的宏文學院速成師範科，留學時間為六個月。其間與同校留學生楊季良、沈養源、易輔臣、馮筱舟、姚韻笙等利用餘暇參觀東京各學校，在大量蒐集資料的基礎上編成《參觀學校圖說》。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著者有機會再遊日本並考察了京都、大阪、神戶等地的學校，且對前書進行增補，並易名為《日本學校圖論》公開刊行。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秋，蕭瑞麟東渡留學習速成師範，翌年春在畢業回國前與同學周華國等人利用餘暇考察東京各類學校及其他機構。所參觀的學校有：常磐小學校（附幼兒園）、東京府立等一高等女學校、華族女學校、盲啞學校、東京美術學校、東京音樂學校、富士見尋常高等小學校、高等工業學校、北豐島郡西個園蠶業講習所、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東京帝國大學、私立赤城小學校、實踐女子學校（附屬女子工藝學校）、帝國教育會體操學校、慈惠病院醫學校、東京府立女子師範學校、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錦町小學校。

四

晚清正是中國教育開始逐步走向近代化的時期。以京師大學堂為代表的各類新式學校的湧現，《欽定學堂章程》和《奏定學堂章程》的頒布，科舉制度的廢除，學部的設立等一系列改革舉措的實施乃是其主要標誌。而推動這些重大舉措

的出臺者，首先是這批邁出國門，對日本教育進行考察、學習，回國后又身體力行從事改革的人們。他們對中國教育近代化的巨大影響，可從三個方面進行概括：

一、推動全社會重視新學之風氣的形成。概觀晚清中國人日本教育考察記錄，有一個明顯的共同點就是字裡行間無不透露出對先進的日本近代教育的贊譽和對落後的中國近代教育的悲嘆。遊歷的感觸往往使他們在回國後大聲疾呼，吁全社會重視新學，廣興學堂，普及近代教育，從而極大地推動了全社會重視新學之風氣的形成。尤其是作為各州縣最高行政長官的知州或知縣的大量東渡及其對日本教育的熱心考察，對推動各地方形成重視新學的風氣更為有益。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七月，受兩江總督端方的委派，新授廣東潮州府遺缺知府吳陰培自備資斧赴日遊歷。回國後，著者將遊歷所得擇要向端方具陳並請代為上奏，其首要內容就是建議興辦女子師範學校及幼兒園。他在奏折中說，普通學以幼兒園為基礎，幼兒園又以女學為基礎，而欲興女學必先重師範，因此「今日興學當以此為第一事」。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二月，受直隸總督袁世凱委派的郭鍾秀以井陘縣知縣的身份赴日遊歷。歸國後，將考察所得，「擇其淺近而切於事情，而又為州縣力能自為者」，列為四條向直隸總督袁世凱稟陳，其中之一就是改私塾為學堂。他認為，只要政府大力提倡，久而久之，人們自然會知道新學之善，學堂自然也會有人來創辦。

二、直接影響學校章程的制訂。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七月頒布的《欽定學堂章程》和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是清末「新政」提倡教育改革之重要成果之一。《欽定學堂章程》後來由於種種原因而沒有付諸實施，但它作為中國近代第一部由國家頒布的學校章程，意義重大；《奏定學堂章程》頒布後在全國得到實施，它的誕生標誌着中國近代學制的正式建立。這兩部學制的制訂與吳汝綸、羅振玉等人的日本考察直接相關。

《欽定學堂章程》為管學大臣張百熙主持制訂。一九〇二年初，張被清政府任命為管學大臣，主持京師大學堂及全國的教育改革。作為主持全國教育的大臣，張很希望有一番作為，上任後很快提出了以京師大學堂的建設和全國性學制章程的制訂為重點的工作思路，並將選聘人材並派人赴日考察作為其思路的重要一環。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初吳汝綸被任命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五月率團東渡考察日本教育。《欽定學堂章程》在吳汝綸赴日考察前就已開始制訂，張百熙也曾命起草者約吳汝綸赴官書局參與起草，但吳因不久就赴日考察而未能赴約，而回國時章程早已上奏，因此吳汝綸實際上未能直接參與學制的起草工作。但是，滯日期間，吳汝綸不僅詳細撰寫日記，還及時以信函的方式向張百熙彙報考察情況及蒐集到的日本教育情報，並提出自己對興辦學堂，制訂學制的意見。這些情報和意見有些就被採納到學制中。

但是，更為充分地體現吳汝綸日本考察成果被直接採用的是《奏定學堂章程》。吳滯日雖只有約四個月，但考察成果却極為豐富，這些成果被彙編在回國前就交由日本三省堂書店出版的《東遊叢錄》中。本書近二十萬字，內容分文部所講、摘抄日記、學校圖表、函札筆談共四大部份，出版後受到了教育界的高度重視，後在《奏定學堂章程》的制訂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把《東遊叢錄》中的日本「現行學校系統」與《奏定學堂章程》中的學校系統圖作一比較，可以發現二者極為相似，其相互關係顯而易見。

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十一月，羅振玉受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的委托携湖北兩湖書院監院劉洪烈、自強學堂教習陳毅、胡均等人赴日考察。回國後，羅振玉不僅整理刊行了考察記《扶桑兩月記》，還先後在《教育世界》上發表有關教育改革的文章，並讓藤田豐八、王國維、樊炳清等人翻譯自己從日本帶回的教育資料。張之洞對此次考察也非常重視，不僅親自多次聽取彙報，而且還命羅振玉及隨行人員在總督府設講座，為學務處官吏、地方官員、各學堂教習等介紹日本的教育情況，歷時長達十天。此外，羅振玉還曾根據考察所得草擬過一部「學制」呈與張之洞和劉坤一，兩人還曾打算聯名為他上奏。衆所周知，《奏定學堂章程》名義上由張百熙、榮慶、張之洞上奏，實則由張之洞主持制訂，其構想受羅振玉的影響不言而喻。此外，與羅振玉一起赴日的陳毅和胡均也深受張之洞的器重，他們不僅為張之洞制訂學制出謀劃策，其中陳毅還直接參與了學制的起草工作。

三、遊歷者主持或參與學校的興辦和管理，直接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赴日教育考察者中，有相當部份在已興辦或打算興辦的學堂任教員或其他職務，也有地方教育行政管理人員，由於他們在日本考察所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又在學校教育的第一線工作，故考察成果往往能很快應用到辦學的實踐中去。有的考察者在回國後還建議繼續選派留學生赴日，直接推動留日運動的發展。

嚴修曾於一九〇二年和一九〇四年兩次赴日考察教育，並著《壬寅東遊日記》和《第二次東遊日記》。一九〇二年，嚴修第一次率兩子自費赴日，並考察了各類學校二十餘所。日本教育的普及，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國後，他借助考察獲得的經驗，在天津致力於舊式學校的改良和新式學校的興辦，以培養新式人材。在他的主導和積極推動下，天津的興學事業如火如茶，至一九〇四年就已創辦新式學堂十餘所。嚴修的興學成就引起了直隸總督袁世凱的注意，一九〇四年五月，受袁世凱的再三邀請，嚴修出任直隸省學校司督辦，就職後又再次東渡進行考察。

實業家張謇於一九〇三年創辦通州師範學校後不久赴日考察教育及實業。歸國後，先後創設幼兒園、通州女子師範